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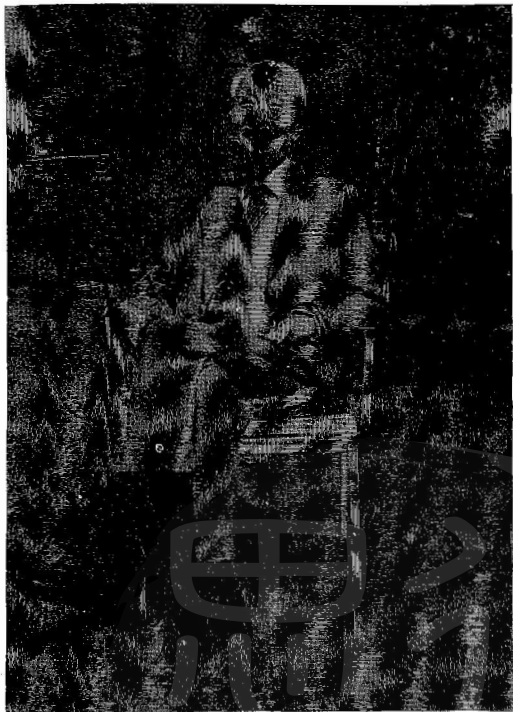
晏陽初九十自述

(二)

晏陽初口述
李又寧撰稿

姚牧師與西學堂

大哥帶我到達姚牧師的西學堂時，是在天黑以後。姚牧師自己來應門。在黯淡的煤油燈下，他的高大身子，穿着黑色長衫，像是一個龐然黑影擋在面前。一抬頭，我看見深陷的兩眼，熠熠發光，照着淺黃的胡髭。這形象，我前此從未見過。小孩子怕鬼，又怕洋人，由於這心理，我頓起害



怕之感。

大哥把我留下，他自己去一客棧。姚牧師領我去學生宿舍，四個人住一間屋子，每張床睡兩人。我馴順地上了床，雖然疲倦不堪，可怎樣也睡不着。明天大哥起程回家，我就看不到親人了。陌生的環境、陌生的老師、陌生的同學，過得來嗎？要是過不來，自己又走不回家。越想越擔心，竟哭出聲來，把姚牧師和同學都鬧醒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姚牧師把大哥從客棧請來，對他說：「令弟還小，還是帶他回家吧！過兩、三年再來罷！」

這話使我羞愧交併。「爹娘滿懷希望我來上學，如果就這樣回去，那有面目見人！」我請求大哥讓我再試一晚。這一晚仍舊想家，但我下決心不哭。再一次，我學會了忍耐。

科舉廢後，中國的教育制度，經歷了一段新舊交替的雜亂時期。姚牧師的西學堂，相當於後來那一種學制，實在很難說。我想，略似後來的高小和初中程度。西學堂有二十個學生，在十四歲到二十歲之間，我是最年幼的一員。大多數學生的家住在保寧，是走讀生，其餘四、五人來自外縣，住在校中。學堂由內地會資助，學生不用繳學費，只繳有限的膳宿費。週日，住宿生一起吃簡單的中國飯。星期日，姚牧師請我們住校生去他家打牙祭。

西學堂和內地會教堂，同在一個院子裏。學堂的規模很小，一間是我們的教室，一間是宿舍，另有一方操場。姚牧師和他的家人，住在學堂隔壁。他一家人，態度謙和，毫無一些在華洋人的驕橫之氣。他學漢人，把

前面的頭髮剃光，後面掛一條黃髮長辮，有時戴瓜皮小帽。也學了中國讀書人的斯文，可是洋溢着青春歡愉的氣息，望之精神一爽。他那時已三十多歲，可朝氣勃勃、身體健壯、精神飽滿。我們學生，受過禮教的束縛，倒顯得少年老成。耳濡目染日久，我們也「返老還童」了。

姚牧師是西學堂的校長，兼主要教師。他一人教數門課程：英文、數學、地理。英文是最重要的，每天都要上。姚牧師是英國人，發音準確，使我受益很多。我們讀英文，也像讀中文一樣，老師讀一句，學生在下面跟着朗誦。這些課目，都沒有教科書。老師把要點寫在黑板上面，學生用石筆抄在石板上面。筆、墨、本子，都是窮學生所買不起的。

本着「為基督征服世界」的戰鬥精神，早期來華的傳教士，企望「征服崇拜偶像的中國」，卻發現孔夫子擋住各方要道。到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，傳教士已從現實中得一結論，那就是耶穌必須與孔子聯盟，才能攻進中國的人心；基督教必先中國化，而後方能化中國。姚牧師和他的西學堂，就是這結論的一種體現。他不但在生活、態度、衣着上儘量中國化，還為我們請了一位秀才來講「四書」，教中文作文。姚牧師每天為我們講解「聖經」，常以儒家的學說作為詮釋。禮拜日，教堂舉行主日崇拜，學生自由參加，不是硬性規定。姚牧師的中國話雖然說得不流暢，他的講道，我們不大聽得懂；他也不擺出道貌岸然、莊嚴神聖的樣子；但從他對我們的愛護備至，諄諄善誘，我們看到了基督的榜樣。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」，可用來形容姚牧師的以身教感人。因此，我和數位同學，於一九〇四年自發的領受洗禮。

姚牧師原是海洋測量員，因見當時有些來華傳教士趾高氣揚，採居高臨下之態，引起中國人的反感，他深以為憾，於是放棄了本業，從事神職，不惜萬里跋涉，想以愛的教育，從根本上感召中國少年，再由他們出去傳播福音。內地會本以佈道為主，不重教育。姚牧師的創辦西學堂，曾引起會內人士的反對。但他終以堅毅和信仰克服了萬難。

唱詩與運動

除了信仰基督和略窺西學的門徑外，西學堂對我有兩項終生的影響。

一是唱「聖詩」。廿世紀初葉，在保寧，聖詠還是「新文明」，大部分的教友對此道茫無所知。因為我的喉嚨不小，姚牧師讓我和另一位同學站在禮拜堂的前排帶頭領唱。無奈這位同學和我，是初生之犢，只會慷慨吟嘯，有時作了「驚人之鳴」，還不自知，因為根本不會看譜，無論是「12345」的，還是豆芽菜的。那位彈小風琴的伴奏者，只好將錯就錯，去舊立新。教友們不知所從，悠悠然各抒己意，共同參加集體創作的混聲曲。後來，我們漸漸學會唱詩，把許多教友帶進了聖樂，共享那莊嚴的韻律。那清麗的詩句。從那時到現在，我生活中最大的享受，也是我唯一的娛樂，是晚間唱幾首聖詩，或聽聖詠的唱片，藉此恢復疲勞，暫忘憂患，舒暢胸懷。溫厚從容的聖樂，給我多少心靈的慰安和精神的鼓勵，沒有它，生活是寂寞的。

西學堂給我的另一長遠的影響，是養成運動的習慣。我生性好動、愛談諧。在家裏的時候，父母親嚴格的管教，壓抑了這種天性。到了西學堂，情況一變。德育和智育之外，姚牧師很注重體育。我們每天有室外活動。我學會打板球（Cricket），而且打得不錯。我最喜歡的是，齊步前進的操練，雄赳赳、氣昂昂，每一步踏下去，都感到力量，都發出回響。因為我操得很起勁兒，嗓子又大，姚牧師總叫我帶頭、司口令。雖然我們不用槍或刀，但一操練起來，一股戰鬥的氣概，油然而生。我們想像自己是基督的十字軍，征討世上的罪惡和不平，以必勝的決心，無畏地前進。青春早已消逝，但當年操練時的豪壯之情，跟隨了我一生。

筋骨得到鍛鍊，我不但長得比小時健壯，而且人也變得活潑有生氣了。從那時起，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做身體的運動，偶而因事無法運動，就覺得萎靡不振。而且，我深深愛上了「運動」這兩個字。六十年來的工作，都是運動——識字運動、平教運動、鄉村建設運動。「運動」可以有不同的詮釋，我的了解是這樣的。按照身體或社會的情況，制定一定的計劃，進行訓練，旨在促進身體或社會的健康發展，取得最高的效率。

我的身體日趨健康，還有一個原因。每年寒暑假，我必定回鄉探親。一次來回，步行山路八百里；一年兩次，就是一千六百里。越走越能走，越走越體強。我一生足力甚健，和這走路很有關係。現在，每天散步兩

小時，不用拐杖。

總的說來，在西學堂四年，我的精神、知識和身體，得到逐步的增進和提昇，心便爲之壯，氣便爲之舒。「如魚得水」，可借來形容我當時綜合的思感。

得到幾位志趣相投的學友，也是我快樂的原因之一。切磋之餘，我們也像一般少年那樣地喜作夸夸之談。一天，一位同學問我：「你將來要做甚麼樣的人？」

我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我願學姚牧師，以愛的教育爲基督征服世界。」

他說：「陽初弟，你的志向高尚，但是，做事總得由近而遠。救中國是當前之急務。現在我們的國家這麼亂、這麼弱，軍隊這麼腐敗，軍官和士兵，吃喝嫖賭，抽大煙，弄得個不像人樣，那裏還能打仗？擾民害民，與盜匪又有什麼分別？國家須要將才來整飭軍隊。我看你操練時，很神氣；施口令，有板有眼，威風凜凜。穿上戎裝，必定更爲煥發。而且你爲人正派，生活樸素，能以身作則，肅清陋習，同時把基督的愛和戰鬥精神傳揚四方，豈不善哉！老弟，你是個將才，可以做楊遇春第二。」他的話大意如此。

這番大議論，贏得在座同學的附和，從此他們就叫我「遇春」。我那時的思想很模糊，一方面深敬姚牧師，希望將來能做傳教士，救人、救世；另一方面看見中國在痛苦地呻吟，覺得社會生了病，卻不知道什麼病，更無從說出醫治的方法。我想救中國，也救自己。但怎麼救？我沒有接觸到同盟會員，當然也沒有參加革命活動。但我心中有一種改革社會的要求。在那樣朦朧的思想狀況下，朋友們善意的推許，引起我種種的遐想。如果能把基督的傳播到軍隊中去，不也是救國、救人、救己的一條道路嗎？少年人容易激動，我真把名字改成「晏遇春」。這個名字，我一直用到一九二一年左右，到我決心從事社會教育的事業。

喜得至友——史文軒

我在西學堂畢業時，姚牧師也正準備回英國爲他的夫人治病。後來，

他任中華內地會倫敦本部的監督。由於他的組織力高，善於佈道，爲人豪邁，談笑風生，成爲英國基督教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。一九四七年，我專誠到英倫去拜訪他，暢敘舊事，無任歡欣。現在我閉上眼睛，還能清晰地記憶他的音容笑貌。

姚牧師離華前，介紹我到成都的華美高等學校去進修。這是當時在四川省講求西學的最高學府，由美國的美以美會（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）所辦。校長精明能幹，後來是華西大學的創辦人。主要教師都是美國的男性傳教士。學生約有一百多人，不收女生。

我在華美高等學校讀了兩年，沒畢業就離開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這學校不重道德教育，缺乏基督教精神。學生賭博、喝酒，還有其它不好的事。在此校唯一足記的事，是學會打棒球（baseball）。

不久，姚牧師寫信介紹我去見一位在成都的年輕傳教士。這一見，關係我以後的生活和思想發展。

史梯瓦特（James Stewart），是這位年輕傳教士的名字。他雖不見經傳，但在我的心中，他是一位偉大人物，象徵爲基督的犧牲自我，以德報怨。英國人，屬於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。他的父親

Robert W. Stewart牧師，早在一八七六年到福建福州傳教，並設神學院。在強權壓迫的情況下，一般中國人是排外的，把傳教士和洋槍大砲混爲一談。一八九五年八月一日，在福建古田，一羣盜匪慘殺了Robert W. Stewart牧師和他的夫人，砍去了其長女Mildred的一條腿。幼子和幼女躲在床底下，幸免於難。另三位較長的兒子，Arthur, Phillip, 和James，在英國讀書，傷痛之餘，更堅定了繼承父志的心願。Arthur D. Stewart牧師後任香港聖保羅書院（St. Paul's College）的院長。史梯瓦特，即James，自澳洲雪梨大學畢業後，一九〇五年，到香港學習中國語文習俗。一九〇七年，奉派到四川傳教。

我初會史梯瓦特，大概是在一九一一年之夏秋之間。他那時在成都籌設一聚會所，類似基督教青年會，以文化和娛樂活動輔導青年。意氣相投，我們大有相見恨晚之感。他邀我幫他計劃，我一口答應了，而且建議名此會所爲「輔仁學社」，取「以友輔仁，以仁輔友」之意。他是此學社的

社長，其下有兩位助手（sub-warden）。一位是英國人，名 O. St. M. Forrester，二十八、九歲，劍橋大學畢業生，也屬於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，出身貴族，他的哥哥有爵位，英人稱之為 Lord。史梯瓦特和 Forrester 的年紀相若，也是貴族之後。另一助手就是我，年紀比他們小十歲左右。我敬他們如兄，他們待我如弟。史梯瓦特佈道或講學，我替他口譯成四川話。

保路運動、辛亥革命相繼發生，成都紛紛亂，學校關門。父母不放心，要我回家。我就在巴中中學教了一個短時期的英文。家鄉的人已開始知道西學的重要了，而我是巴中第一個西學堂畢業生。因此，大家很看得起我，過年時，很多人請我寫春聯。小時，我學過顏字，也頗喜做對子。得機會亮一亮這小能，甚覺洋洋自得。把一幅古老的對聯：「胸無塊壘心常泰，腹有詩書氣自雄」，一改為：「胸無塊壘心常泰，腹有聖經氣自雄」。

我改的春聯下句，反映了我當時的意識形態，那就是，基督的道理，在我胸中已占有一極重要的地位，而且我有意在日常生活中宏揚它。我想做一個傳教士，「為基督征服世界」；又想獻身國家，出人頭地幹一番事業。兩者之間，是有矛盾，我不能解決。但我清楚地意識到，我的將來是在外面，父母親也不願我久留家鄉。所以，一九一二年春夏之間，我再回到成都，跟史梯瓦特合辦輔仁學社。我贈他一個帶中國味的新名字——史文軒。

我這人大概還有一點組織的能力，而且喜歡活動。輔仁學社的文娛節目，大多由我組織，很受成都的知識青年的歡迎。看到學社的工作，蓬蓬勃勃，我很高興，真誠地與青年打成一片。很自然地，我成為史文軒兄的得力助手。

一天，史文軒兄問我，願不願去香港讀大學。我從來沒想到要讀大學，連大學是怎麼回事，都不能想像。香港又那麼遠。別說學費，連路費都不是我這清寒青年所能出得起的。我問他：「你不要我在這裏幫忙嗎？」

他說：「你能幫我的地方很多。但是，我不應當為自己着想。我覺得，你是可造就的，有前途的。呆在這省城，太可惜了。我希望你能深造，將來修成一位傳教士，在本國宏揚正道。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供你上大學，但我在香港的哥哥和姐姐，可以照顧你。我會請 Forrester 先生資助你。」

我很感動，對他說：「你太好了，我永遠不會忘記你。」七十多年過去了，這仍是我對他的在天之靈常說的話。

我常說，「三 C」影響了我一生，就是：孔子（Confucius）、基督（Christ）、和苦力（Coolies）。比較具體地說，是：來自遠古的儒家的民本思想、來自近世的姚牧師和史文軒兄的榜樣、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慧。在我離川東下之前，三者已在我心中埋下火種，等待時機，結合而產生長遠的熱能和光亮。

公害法令彙編

近年來我國輕重工業急速發展，公害問題亦隨之日趨嚴重，一般民家對公害法規瞭解不足，不但無法保障其自身之權益，違法亦不知其然。

本書編者涉獵公害問題多年，特將公害法令及外國法例彙編一冊，企能引發國人對公害之注意，瞭解及防免。另其心得所及，著有「公害剖析」一書（亦由本館出版），有志斯學之士，亦可將兩書參照閱讀，或能更稱利便而收宏效。

趙成意編
定價：四〇九·五元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